

## “吃不饱”与“吃不下”

顾家连

人们在茶余饭后聊天时，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：“喂！你今天吃什么菜？”“唉！这还用问吗？天天是过年（鱼肉）呀！”

“天天是过年。”话虽一句，可它的含意却很远。现在大多数人家的餐桌上，鱼、肉成了家常菜。有时因鱼、肉吃厌了，吃腻了，不菜点时兴菜，调调口味和胃口，饭就难以下咽，常常出现“吃不下”的念头。

“吃不饱”与“吃不下”的情景，虽然只是一“字”之差，但却是反映着改革开放前后两种生活的天壤之别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百姓的生活几乎被各种“票证”套牢，“票证”成了“第二货币”，那时粮、油、棉、布、肉、蛋、煤油、副食、香烟、手表、缝纫机、单车、毛线等好几十种商品均需凭“票”供应。

“票证”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条件下，生产力落后，物资供应与人口日益增长和人们需求日益增大的矛盾就日益显现。那时你想在外面国营餐馆（当时无私人饭店）就餐，有钱还得凭粮票。这样就由不得你总想在外面“奢侈”——大吃大喝，想“腐败”也腐败不起来。假如你到北京或上海等外地的大城市出差，还得揣上全国粮票。此时的全国粮票几乎形同于“硬通货”。不然，身处异地可谓“寸步难行”。此外，有了有限的“票证”，还需排队购买。比如有一次我从部队回家探亲，怀揣“肉票”去肉食站买肉，一大清早就得去排队。熟悉的朋友悄悄告诉我：如果不找个肉食站里熟人的“关系”，排队到最后还不一定能买到肉呢！

计划经济的年代，票证通行天下，缺票几乎很难生活。无论何时何地，票证示人就是硬道理。普通百姓攥着有限的票证，算计着，谨小慎微地过日子。可以说，涵盖面广泛的票证影响着几代人的生活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国家实施改革开放，市场全面放开，经济从此快速发展，商品供应变得越来越充裕，各种票证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现在，我们只要掏钱，啥都买得到。然而，每当我们说起当年的票证生活，年轻的一代甚至觉得不可思议，难以想象。

在这里说说亲身经历的三个小片断，以此显示改革开放前后人们生活的天壤之别：

片断一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在生产大队任信用社会计，经常与困难户打交道。有不少农民为了给孩子们过年时买点鱼腥、荤味，不得不硬着头皮到信用社借上三五块钱的高利息贷款，度过孩子们盼望已久的“年”。俗话说：“大人望插田，小孩盼过年”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。有一段经历使我不禁想起还难以忘怀，那是1964年农历大年三十日，我与大队秘书通过“走后门”“拉关系”，经大队管财贸的副书记批准，每人在信用社借了5元钱。尔后我买了一斤小河鱼，凭票砍了一斤肉，和年迈的母亲、幼小的妹妹正吃着年夜饭，忽

然，从大门外闯进来一衣着破烂、情绪十分激动的老汉。他二话没说，坐在我旁边，端起碗便吃了起来。他见我热情地夹菜给他吃，气消了许多。事后我才知道：为了这个年，他找过大队管财贸的领导，结果不仅没借到钱，反而挨了一顿批。他哽咽道：“别说办年货，我连盐都没买足，这年咋过？”出于同情，我从花剩下的3元多钱中抽出2元给了他。他出门时流着眼泪对我说：“我会晓得报恩的。钱，我会还你的。”这件事虽然过去数十年了，可它总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片断二：1968年3月初，我穿上了当时青年人非常羡慕的“草绿色军装”，当上了人民解放军。记得离家的那天吃早饭，母亲一改过去早餐喝稀饭的惯例，特意为我蒸了4两米（16两1斤的老秤）一碗的两份糙米饭。母亲是想让我离家之前吃顿饱饭。我含着眼泪只吃了一份，剩下的另一份瞒着母亲藏在另一只锅内，留给年幼的妹妹吃。每当想到此幕，我的两眼总是湿漉漉的。可见，那时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啊！

片断三：1977年，部队派我参加河北省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。刚进省委大院，一条巨大横幅就映入我的眼帘：“刘子厚（当时的省委书记），厚子刘，为什么给我二两油（凭票）！”当时在场的一位老大爷对我说：“咱老百姓连一两油也没供应，你们还嫌少，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哇！”那时吃国家粮的职工每人每月可供应二两油指标。就为这两两油和每月供应的二十多斤商品粮，老百姓都羡慕极了。可见当时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。现在许多人得的高血糖、高血脂、高血压等“三高”“富贵病”，那时很少听人说过，而见得最多的是“浮肿病”。

我们那一代人，对各种“票证”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愫，忘不了那段“吃不饱”的漫长岁月，也更能珍惜当今“吃不下”的甜蜜生活。

抚今追昔，感慨万千。梅花香自苦寒来，经历过苦涩，我们要更加珍惜当下。

## 箩筐里的重阳节

张军霞

那天上街，看到有位老人拎着一个箩筐过马路，筐里装着各种时令的瓜果蔬菜，应该是刚从自家菜园里摘的，个个都水灵灵的。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个现在已很少见到的箩筐。小时候，它可是爷爷最常使用的工具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当中，那些数不清的欢乐时光，几乎都与爷爷的这个箩筐有关，里面总是装着时令的瓜果，或者小辈们送给爷爷的罐头和糕点，又或者是他从田间地头捉到的蟋蟀或漂亮的瓢虫，他似乎特别偏爱我这个孙女，有了什么好东西都给我留着。

那时，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，母亲一边种地一边要照顾我和姐姐，每逢家里有了繁重的农活，住在村子另一头的爷爷就会带着工具来帮忙。我记得有一年秋天，多数人家地里的花生还没有收回来，忽然下了一天大雨。雨一停，人们争抢着去地里刨花生，因为天气预报说了，接下来还会有阴雨天。爷爷扔下自己家里的活儿没管，跑到我们家，踩着又湿又软的泥巴，硬是帮着母亲把花生全刨了回来。当天晚上，母亲不顾劳累，硬撑着包了一顿猪肉大葱馅的饺子，把爷爷和奶奶都请到家里来，把热腾腾的饺子端到他们面前，带着歉意说：“今儿是重阳节，我没能好好敬老，反而让你们跟着我受这么大累……”爷爷急忙说：“趁着我这身体还结实，能帮你们一点是一点吧！”奶奶则笑着跟我说：“今年太忙了，明年让你爷爷做点重阳饼，再酿点菊花酒，咱们好好过个重阳节！”

我没吃过重阳饼，更没喝过菊花酒，但在我的想象中，它们一定都是顶尖级的美食，因为爷爷的手非常巧，厨艺更是十分了得，我吃过他亲手做的五仁月饼，比小卖店里卖的那种好吃多了！于是，我就经常缠着爷爷问：“什么时候到明年的重阳节啊，我要吃重阳饼……”爷爷笑着

说：“别急，春天的时候我早点把菊花种上，到时候啥好吃的都少不了你。”

第二年春天，爷爷果然在院子里种了好多不同品种的菊花，秋风刚刚转凉，他就开始忙活起来。酿菊花酒除了用花，还要用糯米与酒曲。糯米，爷爷总是要买最好的那种，回到家还要仔细筛选，尽可能去掉杂质。菊花当然是现成的，白菊，黄菊……菊花不同，酿出来的酒也风味各异，但每一种都清凉甜美。除了酿菊花酒，爷爷还用南瓜加上糯米粉做成了重阳饼。南瓜蒸熟之后加入糯米粉，包上豆沙或芝麻馅，压成小圆饼，放到油锅里一炸，香香的重阳饼就新鲜出炉了。

我虽然盼着过重阳，却分不清农历和阳历。重阳节那天，直到爷爷提着箩筐来到我家，把菊花酒和重阳饼一样样摆到桌子上，我才一声欢呼：“过节喽，重阳节！”这一年秋天庄稼大丰收，母亲从院子里摘了两个最大最红的石榴递给爷爷奶奶，父亲给他们倒上菊花酒，我和姐姐则开心地啃着松软可口的重阳饼，全家人过了一个热闹而又温馨的重阳节。

后来，我们一家多次一起过重阳节，有时赶上收庄稼太忙，爷爷就会把他的箩筐提到田间地头去，大家干活累了吃上一个重阳饼，再抿一口菊花酒，顿时感觉解除了全身的疲惫。有的时候，我分明看着箩筐里的食物吃光了。爷爷却又像变魔术一样，转眼间又从箩筐底部掏出一把甜甜的大红枣。

如今，爷爷和奶奶都已去世多年，只剩下那个大箩筐寂寞地沉睡在老屋的角落里。又到金秋九月，看着街头铺天盖地关于重阳节的广告，我不由格外怀念起了箩筐里的重阳节……

## 岁月深处的篱笆墙

夏学军

乡村的人家，日子过得别有韵味。特别是在人人向往无公害食品的今天，乡间家家户户的菜园子绝对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。“篱落疏疏一径深”，记忆中的篱笆外，总有一条小蛇蜿蜒曲折，仿佛没有多长，却是伸向远方。

农家院的篱笆，主要作用是防止畜禽野兽进来捣乱，给植物营造出安全舒适的生长小环境，顺便也划清了邻里之间的界限。俗话说“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”，篱笆先要扎好桩，才能坚固牢靠，经风雨而不倒。篱笆桩一般是用粗一点的树枝，按照间隔等距的距离，打入土里再加横杆固定，然后在桩与桩之间绑上细树枝就成了篱笆。

小的时候父母忙工作，家里的菜园子都是奶奶打理。奶奶是个爱美的人，不光给我们缝制漂亮的衣服穿，还把单调的篱笆墙也打理得甚是美丽。奶奶贴着篱笆墙种上一行花草和蔬菜，左边是淡紫色的喇叭花爬满墙，右边是豆角秧子攀援而上。每天早上，我顺手摘下一朵喇叭花别在发间，蹦蹦跳跳地上学。放学后，吃着奶奶新鲜豆角做的菜的情景，三十年后依然清晰如昨。

最美的篱笆墙是秋天，上面爬满了各种植物，丝瓜、扁豆、黄瓜、葫芦、藤缠蔓绕，呼唤着清风与阳光，那一墙的姹紫嫣红，谁看了都会眼馋。那是一首最抒情的诗，一幅最唯美的油画，也是奶奶一年当中最高兴的时候。吃不完的蔬菜晒干，收藏起来冬天吃，特别是茄子干泡软之后炖肉，简



俯瞰浏湖秋色

## 地名记忆

## 浏湖，一条水和一座村

尹湘文

山水盘桓，林草覆盖；道路僻次，村舍栉比。鹅鸭嬉游于江湖，牛羊觅食于山陂。田垄间农夫赤脚荷锄，菜园里村姑巧手育苗，庭院中祖孙开心逗乐。

浏湖（2016年与天星村合并，隶炎陵县鹿原镇），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，却是我日思夜盼、久居不厌的乐园。其所有的所有，一切的一切，于我而言都是那么亲切、那么愿意、那么撩人心扉。

## (一)

远离家乡的岁月，日子实在漫长。以前每年回来几次，但“来也匆匆，去也恹恹”，总是很不过瘾，常常如饥似渴。因为，回得再多，也望不断家乡高远湛蓝的天；住得再久，也喝不够家乡清冽甘甜的水。

近几年奉召返乡工作，离家近了，双休日还基本上自由支配，回浏湖的次数也就多了，往往是周五晚上回家，星期一早上再班车进城，两天三晚，比之此前一年才能回三五回，已是足够“奢侈”——人，应该知足，我经常告诫自己。

家里平时只有母亲一个人守着。回家，第一要务当然是做饭，其次是整理卫生，继而菜园打理、设施维修。得闲，就是听“首长”“痛说革命家史”，讲父亲的革命生涯，讲她自己的“苦难辉煌”。当然，再忙，也要挤出时间去浏湖看看，包括流脑上、流脑下、滑道、滩湖……

一不留神，天就黑了。

山村的夜，总是来得那么早，又是那么宁静、那么空旷。即使夏天，母亲也常在7点半前入睡。母亲睡觉不能开电视，电视机关，我也只好上床休息。

然而，毕竟太早，再宁静，也难以入眠。年纪大了，少去想未来，却禁不住思过往。

## (二)

最爱呵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浏湖。最喜欢浏湖的水。碧波荡漾，清冽甘甜，浏湖水真正是上天对家乡的赠礼。斜滩水从1800多米高的八面山一路奔腾而下，七十多公里倾泻直降1600米，汇成浏湖水。

上善浏湖水！灌溉沃土、滋养庄稼、孕育鱼虾、泽润乡亲。总觉得，享不尽她的福，赞不够她的好，颂不完她的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浏湖水清澈见底、甘甜凛冽。乡亲们饮用洗衣，从来河水不分。只有山洪暴发、河水浑浊时，才去挑井水。

野性十足的斜滩水从蓝山麓、磨刀流两个险关奔腾过来后，浪涛素雅、羞羞答答，在棚村湾、反背壑稍事平缓，然后直落流滩湖。一百多米长的流滩湖，被称为“斜滩第一险”，两岸被数百块巨大的岩石壁挤成骨牌状斜插，落差十米之巨。上游一百多米宽的河道突然被挤压成六七米宽的滑道，河水咆哮如雷，滩浪花似雪。

“流滩难过再无险！”当年，斜滩水担负着炎陵中村、船形优质杉木支持各地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使命。杉原木下水被编成木筏，接力成排，然后经流湖、潘家（集材场）入浏水，过茶陵、攸县，在衡阳汇入湘江，通江达海，进城入市，到达厂矿、工地。

对于放排人来说，流滩是最大的难关，甚至是生死考验，说“鬼门关”其实也不夸张。“打杠眼”（木排在急流中突然受阻互相挤压），轻则木排解体、树木折断，重则人员伤亡，场景非常恐怖、凄惨。没有一副好身手，没有一定胆识和经验，吃不了放排“这碗饭”。异乡人大都望而却步，使得这项高风险高收入的副业几成水性好的家乡人民的“独门生意”。对于家乡人，流滩其实蕴藏着财富，是资源，也是机会和方便。生产队里家境好的皆因有人放排。

“打杠眼”，木排折断，造成大量杉树尾、杂木棒、篾索浮游、沉积，少年们藉此获取柴火。同时，因为前面辛苦担心了好几天，过了流滩湖，再无凶险，放排人便经常将木排搁于流脑下，回家休息一两天。这样，少年们便可以在木排上剥下杉树皮来做柴火。

发洪水时，乡亲们就冒雨将洪水携来的大量树木打捞上来，这叫做“捡杉杆”。流滩湖上、滩下，河面均宽，水流相对平缓。流脑上和流脑下的几个港湾，是“捡杉杆”的好码头。洪水过后，林业部门就会派人挨家挨户“搜查”登记，将社员打捞的杉树、松枕木收缴，那是国家财产。至于那些杂柴则用作柴火，有的人家，夏季捡几次“杉杆”可以烧半年。可惜我那时太小，母亲不允许我们兄弟冒险。

岩石壁是天然的晒场，30—50度斜插在滩岸的岩石壁，长期被河水冲刷，没有鸡鸭滋扰，干净又安全。社员们的红薯丝、萝卜丝、酸菜，都挑到流滩滩去日晒风干。

## (三)

丰沛的斜滩水，独特的河滩构造，配套的水利设施，也使得浏湖“鱼米之乡”美名远扬。

那时，浏湖没有真正的鱼塘，但一年四季都有鱼吃。家里来客人了，男人收工后带上渔网，或者赤手空拳去斜滩水一趟，便有了新鲜河鱼。

“赶竿”“捉竿”“守闸待鱼”是浏湖人捕鱼三大特色。

“竿”形象描述了鱼儿顺水上溯的场景。“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”，鱼虾喜欢扎堆。春夏季节，一阵南风吹过，鱼儿成群溯水而上。小溪里，一般是小鱼虾，用捞勺架在小溪入河的口子上，然后沿小溪从上往下赶，小鱼儿纷纷落入捞勺网兜，这叫“赶竿”。大一点的鱼往往在更大更湍急的渠道里扎堆上行，引得人们“浑水摸鱼”，这叫“捉竿”。更大的鱼，会直接在垂立的水闸下面纵身一跃，企图一跳成功。于是，人们坐在堤岸上，手握捞勺下垂，等待鱼儿“自投罗网”，这叫做“守闸待鱼”。最有味的是“捉竿”，一声“上竿了！”所有男人都会放下手中的事情，奔跑河边，和着衣裤下水。小孩和妇女则在岸上帮着装兜。“捉竿”往往不超过二十分钟，有时一次会有百多斤，身手好的一个人可捉得二十斤左右。那场面真是热闹，煞是快活。

有一次在河里游泳，我脚下踩着一只甲鱼，一旁的兄长潜水捉上来，大如脸盆，竟有3.6斤重。两人各分一半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弟弟晚上常去流滩滩捞河虾，一个晚上就一箩筐。子侄外甥们回到家里，高兴地围着一箩箩白透红干干净净的河虾欢呼雀跃。

## (四)

浏湖几乎没有旱涝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从浏湖上游引水的西山水圳建成以后，灌溉农田万亩，此后整个河西公社都没有旱灾。记忆中，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浏湖是整个公社粮食“纲要”（亩产800斤）最早的大队，公社驻队工作人员因此好有面子。

流湖电站是斜滩水流域最早的两个单机过百千瓦电站之一，也是七十年代中期前县里三大主力电站之一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建成后，整个河西公社受益，带给浏湖人的不仅是便利，更有满满的幸福和骄傲。那时，男人们都可以在家洗澡，夏秋，荡桨于电站前池，被浪刺激而又痛快——外地人都不敢入前池激流——冬春，电站倒闸备用发电的三个大木桶中热水随时恭候。夏日，电站有电风扇；夏夜，家里闷热，男人们抱一条单被，躺在电站周围的水泥地上，河风习习、蚊虫不驻，直到天亮；冬天寒冷，电站可以取暖，那里的电炉烘得全身暖和。梅雨时节，主妇们从不担心农产品发霉，送到电站机房，一两个晚上就被热风吹干。

最受益的，还是电站渠道、前池的维修、清淤的工作，那是生产队最好的副业。当年临近生产队分值也就两角到五角不等，我们生产队因为有这么项收入，分值常在七角以上。还有捞砂，也是一条很好的创收渠道。经过流滩滩冲洗的沙子、卵石，粗细分层、粒粒干净，十里八乡都来流滩捞沙子、装卵石。

电站建成正式通电那天晚上，公社在流湖放了专场电影。“高压线长又长，流湖一直到公社，发出电来闪金光。”那时我不到8岁，几十年来，革委会主任任厚容家话致辞的场景一直历历在目。



流经浏湖的斜滩水